



網絡構建、商業拓展與文化創新

香港轉型期間跨界華人企業家的崛起

1979-2009

袁建偉 著

中華書局 通學文叢

中華書局 活學文教

網絡構建、商業拓展與文化創新

香港轉型期間跨界華人企業家的崛起

1979-2009

袁建偉 著

□ 責任編輯：張利方
□ 裝幀設計：高林

網絡構建、商業拓展與文化創新

香港轉型期間跨界華人企業家的崛起（1979-2009）

□

著者
袁建偉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活學文教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一號勵達中心 16 樓
電話：852-3923 9711 傳真：852-2635 1607
電郵：contact@llce.com.hk
網址：WWW.LLCE.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深圳中華商務安全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萬福工業區

□

版次

2012 年 9 月初版

© 201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16 開 (230 mm × 170 mm)

□

ISBN：978-988-8181-24-7

謹以此書獻給葉國華、梁定邦、顧汝德、黃紹倫四位以終身奮鬥推動香港成長與進步的傑出香港人。他們是香港經驗的參與者與締造者，他們的文化成就讓世界了解香港，讓中國融入世界。

謹以此書向以徐四民先生為代表的實業興邦、心繫家國的愛國海外華人精英致敬。他們的智慧與遠見在中國與東南亞之間構築了一座跨文化之橋。

本書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青年基金／自籌經費項目”，項目批准號：11YJC840063。

本書出版得到紹興文理學院出版基金資助。

致 謝

從事香港跨界華人企業家研究對我來說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長征”。非常感謝我的導師黃紹倫講座教授對我一如既往的支持、關懷、指導與幫助。在我研究剛開始的時候，黃教授就鼓勵我繼續以前對於中國與東南亞之間華人商業企業家的研究。對於香港轉型的研究，黃教授建議我從由他和王廣武教授主持的一系列與香港回歸中國主題相關的“香港講座”的錄影材料開始。在回顧這些具有高度歷史價值的錄影帶時，我建立了對於香港商業文化、政治生態與公共政策的初步理解。黃教授對於有香港知識和專業背景的商業精英的崛起的洞察，為我的研究解決了理論難題。黃教授在我整個對香港華人跨界企業家研究的過程中，花費了大量的精力進行指導並全程提供支持。更重要的是，黃教授對於亞洲研究的國際願景和對華人家族企業研究的卓越貢獻，增強了我從事亞洲華人家族企業與跨國網絡研究的信心。

非常感謝顧汝德教授（Professor Leo Goodstadt），他是香港衛奕信（David Wilson）和彭定康（Chris Patten）時代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他的耐心教導幫助我形成了研究香港跨界華人企業家與中國轉型的整體視角。非常感謝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香港 B&P 集團董事局主席葉國華教授給我機會分享他對於香港經驗和中國現代化的理念與思想。葉教授在研究過程中給予了我重要的支持與熱情的關懷。我非常感謝香港首位華人證監會主席、前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梁定邦資深大律師的學術指導與生活關懷。他坦誠地與我分享了很多他參與發展中國資本市場以及大中華地區金融合作的精彩

歷史細節。我也非常感謝香港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陸恭蕙小姐的寶貴學術指導與幫助。她不但熱情地接受訪談，還贈予我很多關於香港研究的有價值的參考書。

值此機會我要感謝已故的徐四民大紫荊勳賢對我的慷慨支持。徐老是資深愛國海外華人領袖，終身致力於支持中國現代化建設。我有幸在他晚年分享他對於香港政治經濟和海外華人企業的深刻觀察。非常感謝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博士在我攻讀香港大學博士期間給予的熱情鼓勵與親切關懷。李博士百忙之中對我的研究與學習的關懷，是我人生中最感動的事件之一。我也要感謝戴德梁行 DTZ 亞太區主席梁振英博士的幫助。他幫我安排了對一位戴德梁行董事的訪談。在閱讀戴德梁行的系列公開出版物過程中，我增強了對於香港房地產企業在中國大陸進行商業拓展的理解。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呂大樂講座教授在我研究的關鍵時刻慷慨給予了重要的學術意見與指導。值此機會我要非常感謝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彭仁賢博士（Dr. Anthony Ferguson）和夫人給予我的家庭般的溫暖與關懷。彭博士給予了我很多寶貴的批評意見，促進了本書的寫作進程。感謝好友梁晴敏小姐、劉曉詩小姐、李均杰先生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和幫助。

非常感謝紹興文理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李生校教授的學術指導與慷慨支持。李教授為我創造了一流的科研與寫作環境，並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予以全程指導、熱情鼓勵與親切關懷。李教授將我引入浙江大型民

營企業集團研究領域，接觸一流的浙江企業家群體，使我進一步拓展了對於華人商業文化與模式的認識。著名浙江大型民營企業——精功集團精築房產董事長金龍順先生在我在紹興安家寫作期間給予我大量慷慨支持與親切關懷，在此深表感謝。非常感謝在我攻讀法學碩士期間尹紹亭教授、莊孔韶教授的耐心指導與大力支持。美國伊利諾亞大學香檳校區人類學系 F.K. Lehman 教授長期關懷指導我的東南亞華人商業研究，為我的學術成長付出了大量寶貴精力。在此向 F.K. Lehman 教授深致謝忱。也很感謝我的學生兼助理葉輝同學、姚良同學為本書的寫作做出的辛勤工作。

袁建偉於風則江畔

2011 年 8 月 23 日

目 錄

第一章 跨界華人企業家精神在現代中國與東南亞的形成

- 跨界企業家與香港社會 2
- 轉折時期跨界華人企業家的概念 5
- 轉折時期對跨界華人企業家研究的理論探討 7
- 跨界華人企業家精神在中國與海外華人社區的形成 12
- 1937 年以前上海的跨界華人企業家 13
- 新加坡和東南亞的華人跨界移民企業家 16
- 1979 年以前香港華人跨界移民企業家的經驗 19
- 本書的研究對象 21
- 探索轉型年代跨界華人企業家的創業 24
- 福建籍跨界企業家與香港和中國的轉型 25
- 福建的開放與福建籍跨界企業家的回歸 28
- 上海的重新國際化與香港廣東籍跨界華人企業家的到來 29
- 香港跨界華人企業家的政治、社會參與（1979-2009） 31

第二章 研究方法的探討

——探尋轉折時期當代華人跨界精英創業歷程

- 觀察香港轉折時期跨界華人企業家的四個宏觀歷史維度 34
- 華人創業是一個持續的發展過程 37
- 中國大陸之外海外華人創業的制度性嵌入 38
- 香港跨界華人企業家需要跨越的不同疆界 39

海外華人企業家作為少數族群企業家在東南亞	41
一國兩制背景下以香港為基地的華人跨界企業家	42
理解華人跨界企業家的創業活動	43
個案選擇與人類學田野工作	48

第三章 在中國和東南亞之間： 香港轉型時期福建移民跨界企業家的崛起

施子清：從教師到華人紡織工業家	59
李群華：從普通工人到亞洲創意玩具製造工業家	70
楊孫西：一個香港工業家的地產之路	81
盧文端：從錄影帶大王到成功的房地產發展商	92
陳守仁：從太平洋塞班島到全球聯泰供應鏈管理	100
“一國兩制”下福建籍跨界企業家的策略	106

第四章 香港經驗與中國實踐： 廣東籍跨界企業家在中國現代轉型期的創業

羅康瑞（瑞安集團）：建設中國新天地	115
梁定邦：發展中國資本市場	139
葉國華（保華生活教育集團有限公司）：香港、台北和上海之間的政治企業家	159
專業網絡、互信關係與策略聯盟： “一國兩制”下廣東籍跨界企業家的武器	174

第五章 香港和內地轉型時期（1979-2009）的跨界企業家

歷史轉型時期的跨界華人企業家創業 180

香港後殖民轉型與中國現代化建設期間跨界華人企業家精神的形成 182

嫁接的花朵——跨界華人企業家的創新實踐 186

“一國兩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家權力、中共官員與跨界企業家 189

1970-1990 年代香港華人跨界企業家的典型特徵

——兼論其與以前的香港和東南亞華人企業家的異同 190

與中國一起轉型

——香港華人跨界企業家的商業策略與網絡構建 192

本書中個案研究的延伸理論探討 194

附錄

香港政商精英高端訪談之一

梁定邦資深大律師：中國資本市場的成長——大中華地區金融合作 200

香港政商精英高端訪談之二

政治企業家葉國華教授：論香港轉型與中國改革 243

香港政商精英高端訪談之三

香港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 / 香港交易所董事陸恭蕙小姐：

論香港企業現代化管治 267

香港政商精英高端訪談之四

顧汝德教授：縱論世界家族企業 289

參考書目 305

第一章

跨界華人企業家精神

在現代中國與東南亞的形成

跨界企業家與香港社會

發生在英帝國與清王朝之間的鴉片戰爭對於中西方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場戰爭的歷史結果 1842 年《南京條約》，也使香港在中西方貿易中佔據了優勢的地理位置。以香港為基礎的華人貿易商人作為買辦推動了處在兩大“帝國邊緣”（Carroll，2007）的香港進出口經濟。華人買辦精英的多元語言溝通能力，圓熟的商業技巧和同香港殖民政府、廣東省和中國大陸各地官府的密切關係，奠定了香港華人企業家的良好成長基礎與發展機遇。

歷史學家 Carroll（2007）和 Smith（2005）的著作濃墨重彩地描繪了香港華商作為買辦和長途貿易商人的跨文化商業活動。這些華商通過他們的志願性組織，例如商會、同鄉會和慈善團體，成功地把他們的貿易和社會網絡拓展到珠江三角洲、長江流域、中國東南和遍佈世界的海外華人社區。憑藉在香港本地和中國國家範圍內的聲望與影響力，他們也成功晉身英國香港殖民地政府和中國大陸的上流社會。

冼玉儀關於東華三院建立的歷史民族志（Sinn，2003）展現了香港華商不僅通過慈善活動建立了他們和大陸故鄉的聯繫，另一方面也增強了他們和在世界各地不斷拓展的海外華人網絡的聯繫。冼玉儀的著作（Sinn，2003）與鄭宏泰和周振威關於香港大佬周壽臣的研究（Zheng and Chow，2006）都表明香港本土的華人精英已經讓他們的本地網絡超越香港殖民地疆界，成功地與廣東省和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建立官方聯繫。最後鄭宏泰和黃紹倫關於香港首富何東（Zheng and Wong，2007）及其子香港將軍何世禮（Zheng and Wong，2008）的兩部社會科學研究作品，展示了一個香港華人精英家族是如何深深捲入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之中，並對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歷史轉折產生影響。

研究香港華人精英的成長，對於理解中國現代轉型宏觀演進的歷史過

程和香港如何從幾個荒蕪的小島發展成為跨國華人世界中最重要經濟與文化中心是十分重要的。王廣武在他題為《香港作為沿海華人的故鄉：一個歷史的維度》的演講中（Wang, 1997）指出香港在中國人海外發展中擁有特殊地位，它是跨國華人群體最重要的文化和經濟中心之一。

1937 到 1945 年的八年抗戰和接下來的三年國共內戰，中斷了中國從晚清王朝洋務運動以來以長江流域為主的開展工業化的努力。在此期間，許多中國大陸的銀行家、工業企業家和專業技術人員從長江三角洲地區移民到英國殖民地香港。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一系列針對商業和工業領域民族資本家的社會主義再教育、公私合營、國有化運動，使很多有海外關係的企業家離開中國大陸，重新在香港、台灣和北美地區定居。

1950 年朝鮮戰爭開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給這些從上海來的移民工業家提供了在香港重建工廠的歷史機遇。從中國大陸逃難到香港的大量難民也給香港的工業發展輸入了廉價勞動力。黃紹倫的經典研究（Wong, 1988）記述了上海移民企業家在香港創業成長的歷史。1989 到 1997 年香港殖民政府最重要的政策制定者之一、金融歷史學家、政治科學家顧汝德在他的書中（Goodstadt, 2007）觀察到香港銀行業和工業的互動發展，匯豐銀行為在香港的華人工業家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重建商業聯繫提供了重要的財政支持。顧先生指明這種金融助力對於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是關鍵因素。除了工業化帶來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香港的航運業也獲益於從上海輸入的充滿活力的移民企業家。董浩雲、包玉剛都發展成為世界級航運業巨子。在由鄭會欣整理注釋後出版的《董浩雲日記》（Cheng, 2004）和包陪慶所著的關於其父包玉剛的傳記（Bao, 2008）中，我們都可以清晰了解到兩大華人航運家族植根香港，進而拓展全球商業空間的艱辛歷程。

英國殖民政府在培育香港華人精英方面扮演著積極角色。第一，港英政府通過官方委任，使一批華人精英成為殖民地官方機構裏的立法局議

員、行政會議成員和太平紳士。第二，港英政府揀選有影響力的本港華商成為諸如香港賽馬會、香港商會、香港工業總會等半官方機構裏的董事或顧問。對於華人精英自身而言，志願性慈善組織和同鄉會組織特別是東華三院是擁有進取心的華商用來成就其領導地位和擴大本地影響力的主要平台。台灣籍著名社會學家金耀基在對區議員的研究中（King，1973），把港英政府選擇培育本地華人精英的過程稱為“行政吸納政治”模式。金耀基在對殖民時期一個區議會的田野實證研究中採用這種模式來分析香港的政治經濟。

香港的經濟成長與政治發展總是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社會與經濟變遷的影響。1970年代末期，香港出口導向型的製造業和中小型工業企業的發展遭遇了不斷上漲的土地價格和工人工資的巨大壓力。海外投資者和本地銀行把更多的資金投入香港的房地產市場，但對發展提升香港工業的全球競爭力缺少投資熱情。1979年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變遷為香港工業提供了巨大的成長和發展空間。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加強了香港同廣東的經濟互動。香港華人工業家的湧入有力地推動了1980年代珠江三角洲工業經濟的崛起。1990年開始香港的華人工業家也積極投身到上海浦東的製造業、服務業和房地產業的發展浪潮，從而為長江三角洲的市場經濟復興提供動力。在過去的三十年裏，中國的改革開放吸引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GDP（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超過東亞地區任何一個國家。香港華人企業家是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經濟轉型中最大的海外投資者。

1980年代早期，香港回歸中國問題即“香港和中國的歷史性約定”（Tsang，1997）成為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後，作為迎接香港回歸的重要準備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起草香港《基本法》的工作和挑選愛國華人精英的統戰工作。兩位親身投入香港政治的學者對於親中華人精英的崛起做了深入研究。首先，顧汝德的研

究（Goodstadt，2000）採用精確的統計學研究，描繪了中國政府選擇培育親中華人精英的路線圖。顧汝德是香港殖民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1989-1997），是當時港英政府重要的政策制定者之一。他的政治遠見和敏銳性開創了這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以供學界深入研究。接下來張炳良和黃保羅（音譯）的研究論文（Cheung and Wong，2004）發現了港英政府、中國政府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特區政府在選擇本地華人精英作為政策顧問和政治同盟者方面的延續性和相似性。

轉折時期跨界華人企業家的概念

以香港為基地的“跨界愛國華人企業家”不是一個政治或意識形態標籤，而是一個概念設計，用來更好地從多元維度來理解香港華人企業家在香港與大中華地區在政治、經濟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在本書中，跨界愛國華人企業家是一個以文化為基礎的概念。它指一批植根香港，對“文化中國”有強烈歸屬感，對香港和中國的前途和未來有承擔，並對實現中國現代化滿懷期待的華人企業家。跨界華人企業家的形成也是傳統儒家思想在華人商業文化內部實現其現代轉型的結果。這裏的跨界愛國華人企業家是指那些懷有濃厚家國情懷，充滿憂患意識，面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終身致力於華人企業管理和積極參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企業家精英。他們企業的管理模式、發展動力和商業網絡，隨着他們不斷創新的文化目標而發生變革。他們堅信他們個人的成功與家族的命運和中國現代轉型的成功休戚相關。他們執著的精神和創新的努力使他們成為歷史上和現時代的文化英雄。

在過去三十年香港和中國的政治經濟轉型中，新一代的香港華人精英

在亞太地區崛起。我希望在這裏開始對福建和廣東兩個商業團體在香港回歸中國過程中，如何進行具有新時代風格的華人創業過程和構建跨界商業和政治網絡展開探討。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探索跨界華人企業家在香港、中國大陸和全球市場創建和拓展商業網絡的內部和外部動力。我希望通過考量這些跨界華人企業家的政治和經濟實踐活動，能夠為在知識經濟背景下更好地理解華人創業打開新的研究窗口。

本書中的跨界企業家的概念深深地嵌入於宏觀歷史結構下對華人商業敘述的理解當中。跨界企業家不僅在市場上取得商業成就，也對創建新的華人機構和社會發展有所貢獻。在現代中國歷史上也同時存在其他類型的跨界企業家。例如在中國腹地、內外蒙古和俄國長途跋涉的山西商人；航行在南中國海和東南亞的福建貿易商人；穿行在東南亞大陸熱帶雨林和中國西南多民族地區、西藏雪山和印度之間的雲南陸上商幫；在馬來西亞和婆羅洲開墾的華人橡膠和礦產企業家；在新加坡成長起來的華人工業家。這些跨界華人企業家都為中國的早期現代化發展做了機構性創新和文化上的貢獻。他們的海上和陸上長途貿易網絡，不僅把他們的故鄉和東南亞的定居地聯繫起來，也把以農耕文化為根基的中國人儒家商業傳統和以工業為基礎的西方現代國際貿易和金融實踐連接在一起。

同西方公司的跨文化貿易為跨界華人企業家提供了和資本主義經濟接觸的廣泛機會。他們從西方世界學習到的社會變革新觀念，增強了他們追求中國地方和國家政治經濟體系現代變革的熱情。他們成為創新中國和東南亞沿海城市現代都市消費文化的領導者。對於跨界華人企業家的研究，是理解中國企業家精神和商業網絡的核心問題。

十九世紀以來，活躍於廣州、香港、廈門、上海等中國沿海開放城市的中國人買辦也都是中國與西方世界貿易中的跨界企業家。一方面，華人買辦與太古、怡和、匯豐、英美煙草公司和日本大企業等跨國商業集團密切合作，另一方面，他們創建了自己的企業同西方和日本大公司競爭。但

在民國歷史和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書寫中，他們被簡單地否定成“西方資本主義的走狗”。

轉折時期對跨界華人企業家研究的理論探討

郝延平（Hao Yen-ping）關於華人買辦的著作（Hao，1970）是第一部對華人買辦的社會和文化貢獻做出公允學術評價的詳細歷史學研究。他認為活躍在中國沿海城市的華人買辦，是新商業革命的傑出領導者和新都市消費文化的創造者。高家龍（Cochran）通過對華人醫藥企業家對創造現代中國消費文化貢獻的研究（Cochran，2006），為理解華人企業家跨界創業精神作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高家龍的研究表明跨界華人醫藥企業家對新的商業模式和商業實踐做出了制度上的創新與貢獻，並且發現華人跨界企業家的創業動力依賴於現代華商對於制度性創新的熱情和他們構建跨界網絡的能力。高家龍早期研究中國民族煙草資本家與世界煙草巨頭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市場上進行商業競爭的經典作品（Cochran，1980），展現了由簡昭南創辦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如何在與英美煙草公司的劇烈商業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的歷程。高家龍（Cochran，1980）很清楚地指出了一個處在弱勢地位的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可以使用“民族主義”作為有效的廣告策略和與外商作商業競爭的武器。衝突、談判、妥協、學習、適應和變革是自從晚清以來中國商業實踐遭遇世界資本主義的主題變奏。

高家龍的一個精彩的歷史民族志（Cochran，2000）記錄了1937年中日戰爭以前中國商業企業發展的歷程。在該書中，他表明當中國人社會網絡遭遇到西方科層制管理組織結構時，跨界華人企業家諸如紡織工業家榮宗敬、火柴大王劉鴻生創造了一種融合了西方科層化組織結構優勢和中國人